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就与经验

——基于域观经济学的阐释

李曦辉 弋生辉 黄基鑫

摘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的赓续探索,向世界昭示了人类文明模式并非只有西方一种模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提供了现代化的新路径,向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以域观经济学为研究范式,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文明视角,对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进程进行阐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体现了“制度形态”;领导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潮流,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彰显了“经济理性”;进入新时代,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凸显了“价值文化”。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特征;党的历代领导人一脉相承的思想观念,是中国式现代化持续进步的关键因素;以域观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学中国学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产物。

关键词: 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物质文明; 域观经济学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2.05.001

2021年11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①。《决议》中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奋斗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创造的伟大奇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生动刻画出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提供了理论支撑和行动指南,具有重要的人类文明价值和世界意义。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②。这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工业化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创造了人类历史继西方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后的又一次最伟大的成就,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发展的面貌和全球化发展的格局。

自1840年开始,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侵略过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思想深深地烙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站起来”的目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及其国际比较研究”(19ZDA173)。

作者简介: 李曦辉,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北京 100081; xihui_li@qq.com); 弋生辉,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1; yishenghui@muc.edu.cn); 黄基鑫(通讯作者),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北京 100081; hjx@muc.edu.cn)。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 访问日期:2021年11月17日。

②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标。在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了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不懈奋斗,最终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人民对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得以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改善,轻重工业均得以显著发展,为后续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创立了制度根基。

随着工业的发展,物质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断,以此为起点,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融入了世界经济潮流。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经济总量持续提升,已稳居世界第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富起来的目标,彰显了经济理性的重要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丰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党的十九大再一次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论断。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开启了强起来的宏伟篇章: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GDP总量突破百万亿元大关,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有了质的飞跃;彻底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得以改善;遏制了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既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又快速恢复了经济。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障、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体现了价值文化的魅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指出,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必须要用新的范式思维以突破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他提出“域观经济学”这一概念与范式。域观经济学观察和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由宪法确认的居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决定性的角色存在、重要地位和穿透性作用^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基于中国人口巨大的特殊国情,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最终目的在于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构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以贯之的动机机理、本质特征和逻辑线索。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进入了不可逆转的伟大复兴历史进程,这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实现的。域观经济学可弥补现有经济学对中国式现代化解释的不足,全方位对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五大特征。

一、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站起来阶段,第二阶段是富起来阶段,第三阶段是强起来阶段。

(一)推翻三座大山

关于“站起来”的阶段,《决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严重的阻碍,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加之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固有的弊病,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就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路德语)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以及由市场垄断所引起的成倍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③“殖民制度宣布,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④“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

^① 金碚:《中国经济70年发展新观察》,《社会科学文摘》2019年第12期。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访问日期:2021年11月17日。

^③ 马克思:《资本论》,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4页。

人名叫鸦片的麻醉剂”^①，运往中国的鸦片数量在 18 世纪末时为 1814 箱每年，到了 1839 年，这一数量已经增长了近 20 倍，达到 40200 箱每年^②。英国“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③。统计资料显示，仅 1835 至 1836 年度，英国从时为其殖民地的印度所获得的鸦片收入就有近 150 万英镑，占到当年财政总收入的 7.41%^④。从中国所掠夺的黄金白银更是数不胜数。

在中国近代史上，除武力之外，外债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又一重要手段。帝国主义通过借款给中国反动政府的办法，从政治上、经济上对中国进行控制；中国的反动政府则又通过借款勾结外国侵略势力，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清政府长年入不敷出，只好选择了大量借外债的方式来弥补亏空，然而这一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1885 年，外债占到了岁入的 17.63%。而外债的担保品主要是关税，仅一小部分是厘金及其他收入，这就导致清政府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关税自主权。按照历年海关报告计算，在清政府关税收入中，支付外债本利的款项平均约占 15.8%，最多的一年（1892 年）占 19.6%^⑤。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经千难、历万险，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中华民族开启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正如 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⑥。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制度建设，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摸索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制度保障，探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与建设。如在 1949 年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 1954 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建立伊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开始了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程，这注定充满艰辛。这期间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阶级约 7 亿亩土地，分给 3 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免除了土地改革前农民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 700 亿斤粮食的地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时也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收了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凭借政权力量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这些资产收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构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经济物质技术基础的最主要部分”^⑦。按照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论述，“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⑧以此为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启了建立

①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14 页。

② 翦伯赞、郑天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461-462 页。

③ 马克思：《英国人在华的残暴行为》，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92-93 页。

④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6 页。

⑤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 5 页。

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81 年 7 月 1 日，第 1 版。

⑦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21 年，第 16 页、58 页、37 页。

⑧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414 页。

公有制经济的探索,这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关于物质文明方面的有益探索。

(三)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毛泽东指出,“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因此,“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①。新中国成立伊始,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毛泽东在“一五”计划期间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②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52年时,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42.9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仅为141.1亿元,远低于第一产业增加值。为此党的八大报告提出,“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③到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收官的197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279.7亿元,相较于1952年的679.1亿元增长了两倍多。第一产业增加值达到793.3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918.1亿元。自此之后,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始终大于第一产业。其后,我国对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进行了完善,提出建立比较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明确提出“基本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说,“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象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象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⑤在《论十大关系》等文件的指导下,中国的轻工业和重工业没有出现发展失衡的情况。1949年时轻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73.6%,随着轻工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需要得以满足,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在此基础上,逐步有序地调整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重。1972年时,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57.1%^⑥。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带领人民不断探索人类文明的新形态。1964年,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向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就曾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⑦这其中既关注了发展方式的创新问题,又强调了制度创新的载体问题,就是任何创新都要以中华民族为依托,不断丰富中华文明。

有关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具体目标,刘少奇于1962年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书面报告中作过阐述。在报告中,党中央设立了1963年到1972年的发展目标,一是“按照勤俭建国的原则和不高的标准,基本上解决我国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二是“基本上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经济体系,在科学技术方面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接近现代工业大国的水平”^⑧。工业生产指数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点。根据工业统计方面的资料,以1970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③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23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75页。

⑤ 《论十大关系》,《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6日,第1版。

⑥ 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物资统计司:《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8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第19-20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1页。

⑧ 《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9页。

年为基期(设中国当所生产指数为 100),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工业生产指数的变化可知,1949 年时,中国的工业生产指数为 5,远低于英国的 54 和美国的 38,甚至印度的工业生产指数都有 27,远远高于中国。到了 1972 年时,中国的工业生产指数达到 123,美国和英国分别为 111 和 102。自此之后,中国的工业生产指数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圆满完成了 1962 年所设定的目标。在完成了产量目标的同时,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在世界的位次也有了显著提升。钢产量在 1949 年时位次为 29,到 1957 年提升到第 9 位,1978 年位列第 5;原煤产量在 1949 年时排第 9 位,1957 年时提升到第 5 位,1978 年位列第 3;发电量在 1949 年时位次为 25,到了 1957 年时提升到第 13 位,1978 年位列第 7。1978 年时,原油产量跻身第 8 位,水泥产量在世界排第 4 位,化肥产量排到了第 3 位,布的产量更是排到第 1 位^①。总的看来,基于中华文明和中国道路的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当时就已开启了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程。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②。在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持续探索中,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之前的人类文明成果,而是进行辩证分析,汲取精华、摒弃不足,所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得以在总结提高的基础上,不断持续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彰显经济理性:融入世界经济潮流,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

《决议》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③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我们以惊人的勇气进行探索,就像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所讲的那样,“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④。这体现了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则。正是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开启了富起来的新进程。《决议》总结道,“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发展生产力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核心目标。因为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实现小康的目标就无从谈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向富起来时代的转折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会议指出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⑤。自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召开这 30 多年的时间,我们党一直带领全国人民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我们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的姓“资”姓“社”的讨论,而是进行探索

① 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物资统计司:《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84》,第 204、206 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81 年 7 月 1 日,第 1 版。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 访问日期:2021 年 11 月 17 日。

④ 《列宁全集》第 3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11 页。

⑤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21 年,第 143 页。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尝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议,制定了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既要超越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的不足,又希望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先进经验,核心就是发展生产力。

(二)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经济发展思想

对于运用何种手段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富裕的思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上是一以贯之的。毛泽东在1958年批评了那些急于废除商品生产的错误主张,认为有些人“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①。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②邓小平在1988年和1992年分别提出,“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③。江泽民在1997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④。胡锦涛在2005年提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重克服市场的缺陷和防范其可能引发经济的较大波动……健全的市场机制,有效的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⑤。习近平2001年在福建工作时就认为,“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社会制度上能够越过‘卡夫丁峡谷’,并不等于它们在经济上也必然能够越过商品经济的‘卡夫丁峡谷’”,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这样的表述和设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商品经济是那些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俄国如此,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更是如此”。“既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离不开商品经济特别是发达的商品经济,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与市场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7、43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6、373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科学发展》,第83-86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第17页。

经济是相容的”^①。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认识来看,他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知是一脉相承的,都希望运用人类已创造出来的经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来实现人民的幸福与富裕。他们都没有囿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来进行思考与引领实践,都在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方法、新路径,希望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导中国富起来

就全球范围来看,各国(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参照《中国统计年鉴 2021》,选取 2020 年中国与各国(地区)海关货物进出口总额最大的几个国家(地区),和中国一起作为研究样本。最终选取澳大利亚(AUS)、中国(CHN)、德国(DEU)、法国(FRA)、英国(GBR)、日本(JPN)、韩国(KOR)、美国(USA)为分析样本。利用国际投入产出表(WIOD2013 版),使用投入产出方法计算各国之间的直接消耗系数,在计算过程中,将未选取的其他国家合并为 ROW(Rest of World)。在此基础上,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计算网络密度,用以反映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密切程度。自 1995 年以来,网络密度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表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素在全球的流动与日俱增,世界各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在融入国际经济大潮的过程中,中国不断提升自身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实现了长足发展。而西方传统工业大国的经济增长乏力,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未出现显著攀升。在投入产出法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计算各国在各年度世界经济网络中的相对度数中心度,用以反映各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变化情况。相对度数中心度的取值范围在 0 到 1 之间,在网络中的地位越重要,相对度数中心度越接近 1。为方便起见,我们将分析结果绘制在图中,如图 1 所示。1995 年时,美国的相对度数中心度最接近 1,处于网络的最中心,紧随其后的是德国和日本,中国则排在非常靠后的位置。2001 年中国加入 WTO,更加深度地融入国际经济大潮中,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得以不断提升。2001 年超过法国,2003 年超过日本,2004 年超过英国,2007 年超过美国和德国。2007 年之后,中国的相对度数中心度一直为 1,替代美国成为网络中最重要经济体。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地位提升的同时,以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工业国的经济地位未出现显著攀升,甚至一些国家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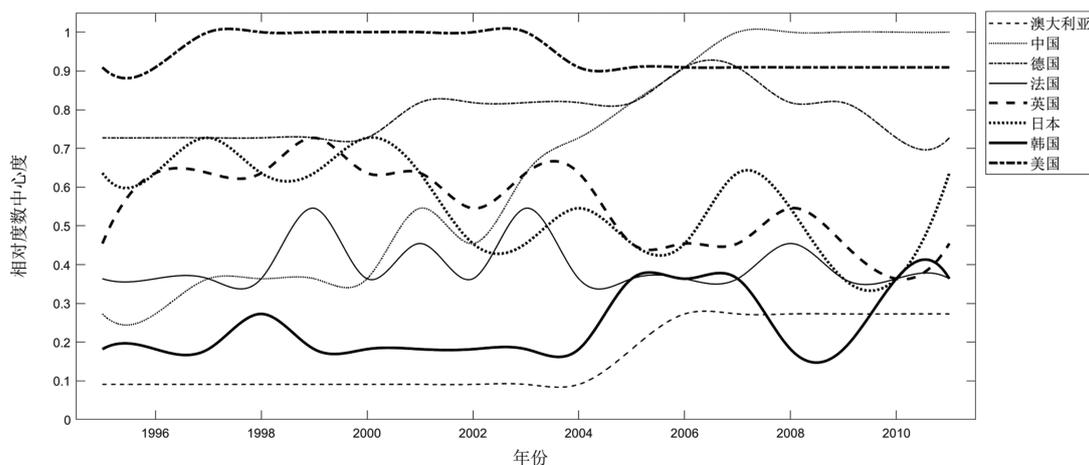


图 1 1995-2011 年主要经济体相对度数中心度的变化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投入产出模型计算的结果整理绘制。

^① 郭冠清:《论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认识〉一文的学术贡献》,《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 期。

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使用投入产出计算得到的直接消耗系数,通过计算其他各国对于某一国直接消耗系数的均值,用以表征该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程度。这一均值越大,表明其他各国对该国越依赖,该国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实力也将会得到更大的提升。由图2可知,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世界各国经济整体出现下降趋势。除此之外,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直接消耗系数的均值一直呈增长趋势,并于2010年超过德国,2011年超过美国。这表明中国与世界经济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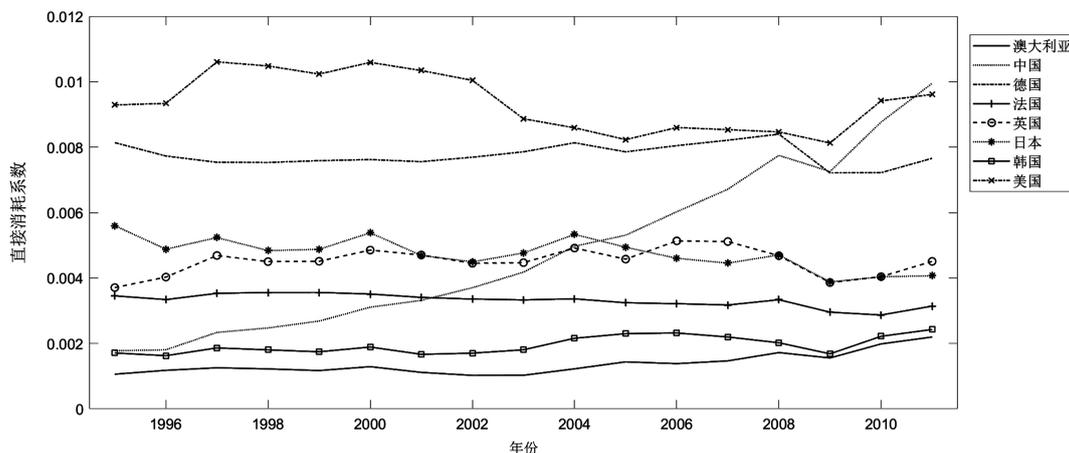


图2 他国对中国直接消耗系数均值变化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投入产出模型的计算结果整理绘制。

在相对度数中心度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可以计算得到相对度数中心势指数,用以反映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之间的差异情况。相对度数中心势指数的值越大,代表着各国之间的差异越大,表明世界各国的中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世界经济呈现出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经济全球化应当带来各国共同发展,理应呈现去中心化的趋势。经济全球化设想的是一个无障碍的自由竞技场,规则透明,裁判公正,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规模—范围效益的最大化,而现实的地缘政治状态则如同荆棘丛生、险象环生的崇山峻岭,道路阻碍,盗贼猖獗^①。自1995年以来,相对度数中心势指数呈现出先波动下降,2008年之后又呈波动上升的态势。说明在2008年之前,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体现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义。在此之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思潮在西方国家普遍传播,逆全球化现象愈演愈烈,使得各国之间的差距又呈现出逐渐扩大的态势。西方发展道路面临范式失效的挑战,越来越无法解释世界经济现实,经济全球化也陷入一片混乱,亟须新的指导理论,这为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提供了绝佳的机遇。相对接近中心势指数和相对中介中心势指数的计算结果也支持此观点。

通过计算接近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特征向量中心度等指标以全面反映各国贸易网络的真实情况。由分析结果可知,中国越来越接近网络中心,同时中国为各国贸易提供了越来越重要的连接作用。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地位的上升和欧美日等国地位的下降,均验证了中国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方向的正确性。中国没有参照西方的文明形态,没有走西方的工业化道路,依然实现了经济实力的攀升,为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积累了经济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用不容辩驳的客观事实,向世界各国展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探索的实践,昭示了人类文明绝非只有西方文明的单一形态。在时代的呼唤下,中国有义务、也有能力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的同时,没有侵犯他国利益,也没有唯我独大,挑起事端,制造摩擦,亦没有践踏全世界人民对于美好生活朴素而又真挚的向往。在中

① 金碛:《论经济全球化3.0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期。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始终在探索着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丰富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进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为世界上众多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拓展了新的途径,提供了新的方案,分享了新的模式。

三、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

(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决议》特别提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清晰地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提供了现代化新路径,人类文明模式并非只有西方一种,未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还有中国路径可以借鉴。

关于文明,有学者认为,它是一个民族应对环境的总成绩,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②。狭义的文明限于物质领域的发展,广义的文明包括物质领域的发展和精神领域的进步。文化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可分为物质、制度、习俗、精神等层面;狭义的文化,主要指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也就是上述广义理解中的第四个层面^③。2021年1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发表的《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特别致辞指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了方法论基础。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④,说明了人类走向文明的路径是多样的。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人向世界昭示,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现代化探索,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明形态。对于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而言,我们贡献给世界的就是与众不同的中华文明,它必须采用中华民族特有的形式予以承载。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⑤。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的系列政策、推出的系列举措,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区域协调发展、科技领域新型举国体制等,大多数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饱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素,皆是希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人类的中国思想贡献给世界,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 访问日期:2021年11月17日。

② 胡适:《胡适文存三集》(上)1—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30年,第4页。

③ 王汝良、侯传文:《“文化”与“文明”综辨》,《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2月23日,第10版。

④ 《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3页。

⑤ 马建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努力做好决策咨询工作》,《中国经济时报》2021年11月30日,第2版。

希望实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决议》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中,对西方主流文化思想表示了担忧。“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由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利”。此前,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人类“只存在着一条文明之河,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所有其他文明之河都或者从属于它,或者消失在荒漠之中。”“此时,文明意味着西方文明,国际法意味着源自格劳修斯传统的西方国际法,国际体系是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主体是主权的而文明化的民族国家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领土”。^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恰恰相反,认为世界万物是相互依存的,不存在中心—外围、核心—边缘、起源—非起源之说。秦亚青指出,“从中国辩证法的元关系角度思考,没有一方,相对立的另一方就不能存在,因为一方为另一方的生存、存在和转化提供条件。正如太极图像所表述的那样,二者在互容性关系中共生共存,形成一个有机整体”^②。在这种“矛盾共生共存”中国传统文化观下,我们较好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新范式,塑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中华文明再创辉煌

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坚持平等参与、共同进步、互利共赢等主张,发展出了与秉持“中心—外围”“核心—边缘”的西方不一样的文明形态。基于 2016 版 WIOD 中列出的 44 国之间的投入产出数据,使用投入产出模型和价值增值分析方法计算各国之间的价值增值情况。按照塞缪尔·亨廷顿对世界主要文明进行的分类,重点对比研究中华文明(Sinic)和西方文明。塞缪尔·亨廷顿指出,“许多学者所使用的‘中华’(Sinic)一词,恰当地描述了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华人群体的共同文化。”“西方文明的出现通常被追溯到大约公元 700 到 800 年。学者一般认为它有三大组成部分,分布于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拉丁美洲虽然与西方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发展成了一支独立的拉丁美洲文明,因此“西方就包括欧洲、北美,加上其他欧洲人居住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③。

在这一分类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内部国家之间的网络密度,用以表征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密切程度。发现对于中华文明而言,2000 年时网络密度较低,表明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是很紧密,这主要是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他国的经济依赖没有那么大所致。随着中华文明的主要国家——中国加入 WTO,世界各国的综合实力得以提升,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因此中华文明的网络密度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2014 年网络密度已经与西方文明相当。反观西方文明,在十多年的变迁过程中,网络密度仅出现小幅度的提升,表明西方文明各国之间没有因为各自经济的发展而表现出更紧密的经济联系。

进一步,对比分析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国家价值增值的情况。可以将各自文明所获得的价值增值分为 3 个部分:各自文明的国家从本国所获得的价值增值、各自文明的国家从本文明的其他国家所获得的价值增值、各自文明的国家从本文明之外的其他国家所获得的价值增值。由表 1 可知,中华文明各国从本文明的其他国家所获得的价值增值占比始终小于西方文明的这一占比,这体现了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中华文明秉持合作共赢的原则,各自经济在发展的同时,从文明内部其他国家所获得的价值增值占比较少,从而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而西方文明秉持“中心—外围”理念,对于非西方文明是如此,对于文明内部的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西方文明各国在

①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年,第 2、37、41 页。

②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94 页。

③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29-31 页。

发展过程中,始终将自己置身在中心的位置,不断地从其他国家“榨取”价值。分析这一比值的均值情况,更能显著地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中华文明从本文明内其他国家所获得价值增值的占比平均为 0.0085,而西方文明的这一占比为 0.0838,接近中华文明的 10 倍。

表 1 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价值增值分解

年份	中华文明			西方文明		
	本国	本文明	其他国家	本国	本文明	其他国家
2000	0.7392	0.0046	0.2562	0.7833	0.0838	0.1328
2001	0.7458	0.0049	0.2492	0.7901	0.0820	0.1278
2002	0.7281	0.0062	0.2657	0.7928	0.0813	0.1259
2003	0.7042	0.0068	0.2890	0.7897	0.0840	0.1263
2004	0.6727	0.0086	0.3187	0.7791	0.0864	0.1345
2005	0.6501	0.0096	0.3403	0.7740	0.0867	0.1393
2006	0.6313	0.0100	0.3587	0.7636	0.0876	0.1488
2007	0.6372	0.0098	0.3529	0.7483	0.0900	0.1617
2008	0.6510	0.0095	0.3396	0.7361	0.0895	0.1744
2009	0.7093	0.0089	0.2818	0.7645	0.0777	0.1578
2010	0.6893	0.0104	0.3002	0.7485	0.0809	0.1706
2011	0.6929	0.0109	0.2962	0.7320	0.0846	0.1834
2012	0.7025	0.0101	0.2874	0.7339	0.0809	0.1852
2013	0.7116	0.0093	0.2791	0.7335	0.0804	0.1861
2014	0.7174	0.0085	0.2741	0.7346	0.0809	0.1845

数据来源:根据投入产出模型的计算结果自行整理。

进一步地,以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国家出口到其他国家的总额为自变量,代表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出口到其他国家商品价值的多寡。将商品出口到其他国家,就会获得相应的价值增值,因此以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国家出口商品从其他国家所获得的价值增值为因变量进行趋势分析。计算结果表明,出口单位价值的产品,西方国家从其他国家所获得的价值增值大于中华文明。随着贸易额的增大,这一比值的极限趋向于 5.6%,表明西方国家从其他国家所获得的价值增值将比中华文明高 5.6%。

在对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分析的基础上,下面将重点聚焦于各自文明的代表国家:中国和美国。基于两种文明的分析表征了各国的发展受着不同文明的影响,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参照前述做法,将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替换为中国和美国,分析中国和美国出口商品额与所获得的价值增值的变化情况。由计算结果可知,出口一单位价值的产品,美国从其他国家所获得的价值增值大于中国。随着贸易额的增大,这一比值的极限趋向于 5.5%,表明了美国从其他国家所获得的价值增值将比中国高 5.5%。然而美国高价值增值的事实并没有带来美国在世界经济地位的上升,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有研究指出,“伴随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国际市场消费的重心和中心则会发生相应的调整 and 变化。目前,世界经济格局出现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东升西降”,“中国市场规模扩张作为全球消费市场重心‘东升西降’的重要引擎,未来的消费需求不仅在规模上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对世界其他各国的需

求也有一定的引领和示范作用”^①。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各国 GDP 统计数据计算可知,1960 年,美国 GDP 占全球 GDP 的比重达到 47.14%,中国为 5.18%。到了 2020 年,美国占全球 GDP 的比重降低到 25.34%,而中国上升到 17.82%。自 2010 年超过日本后,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变化的背后,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助力。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指导中国发展的实践,才使得中国经济焕发出活力,最终成长为参天大树。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开始,中国 GDP 始终处于正增长状态。而美国在同一时期,有 6 年处于负增长。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增速更是降到近 60 年来的最低值,达到-3.49%。中国在经济总量指标增长的同时,人均 GDP 也快速增长。1987 年,人均 GDP 突破 1000 元人民币,16 年之后突破了 1 万元人民币。随后,人均 GDP 进入飞速提高阶段。2007 年突破 2 万元人民币,之后仅用了 6 年时间就翻了一番,于 2013 年突破 4 万元大关。后又分别于 2016 年、2018 年和 2019 年突破了 5 万元、6 万元和 7 万元人民币,标志着中国进入人均 GDP 1 万美元国家行列。这意味着人民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生活条件有了显著改善。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步入 21 世纪之时,中国贫困人口比例约为 49.8%,几乎占全国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到了 2020 年底,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充分改善和保障了民生,创造了一个奇迹。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衡量:健康长寿(a long and health life)、知识渊博(being knowledgeable)和体面的生活水平(have a decent standard of living)。健康长寿采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来测量,知识渊博通过 25 岁及以上成年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学龄儿童预期受教育年限来测量,体面的生活水平采用人均国民总收入来测量。本文根据联合国数据库,整理得到中国和美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如表 2 所示。

表 2 中美人类发展指数

国家	1990	2000	2010	2014	2015	2017	2018	2019
中国	0.499	0.588	0.699	0.731	0.739	0.750	0.755	0.761
美国	0.865	0.886	0.916	0.920	0.921	0.924	0.925	0.926

数据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

由表 2 可知,1990 年至 2019 年美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大于中国。但从 1990 年以来,中国始终保持着 1.47%的年均增速,而美国的年均增速仅有 0.24%。同时结合世界银行数据库查找的人均 GDP,可以计算得出,自 1990 年到 2019 年,人均 GDP 每增加 1 万美元,将带来中国人类发展指数 0.2647 的增长,而美国人类发展指数仅增长 0.0147。同时,从 2014 年到 2019 年,美国人类发展指数在世界的排名倒退了 3 位,而中国则前进了 12 位。从 GDP 总量与人均寿命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出,中国与美国具有相同经济总量时,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虽然小于美国,但总体来看差距不大。如 2014 年中国 GDP 总量突破 10 万亿美元时,人均预期寿命为 75.6 岁,美国在 GDP 总量突破 10 万亿美元的 2000 年,其人均预期寿命为 76.6 岁。从中美两国人均 GDP 来看,1978 年,美国人均 GDP 突破 1 万美元,其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3.4 岁,到了中国人均 GDP 突破 1 万美元的 2019 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6.9 岁。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GDP 总量不断提高,人均 GDP 也会不断提高。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在不远的将来会追赶上美国。

在科技领域实施新型举国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新探索,具有鲜明的中华文

① 戴翔、金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基于全球分工演进视角》,《开放导报》2021 年第 5 期。

化特征。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认为,“流过中国北部及中部的黄河下游,时常泛滥而改变河道,造成巨大的沼泽。这些沼泽地的排水、整理及筑堤,需要原始人类所不具备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而建立并维持灌溉制度所必需的水利工程,要想完全由私人完成是不可能的,无论他是怎样一个富有的地主,水利工程必定要由国家经营。”^①中国历史塑造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农耕文明代表的中华民族,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的文明时代即奴隶社会开始,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发端于城邦制的西方社会则是另一种传统,西方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化存在着根本的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罗马始终只不过是一个城市,它与各行省之间的联系几乎仅仅是政治上的联系,因而这种联系自然也就可能为政治事件所破坏。”^②这说明西方更依赖个体、城邦,国家的作用是有限的,仅仅限于政治层面,这样的历史脉络,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中还能依稀见到影子。所以说,西方的科技活动只能依赖个体的自由创造,而中国的科技创新则能够运用新型的举国体制,其实这都是各自的传统文化在影响着创新主体,并让创新主体表现出不一样的特征,从而发展出差异化的创新体制。

总的看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与继承,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和飞跃,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四、中国的伟大实践能够滋养出中国经济理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实践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站起来”的阶段,我们注重制度的变革,坚持公有制的先进制度,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第二阶段“富起来”的阶段,我们大力张扬经济理性,唤起了人们的财富创造欲望,国民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第三阶段“强起来”的阶段,我们重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中华文化融入经济发展之中,实现了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域观经济学就是将文化、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发展理论的尝试,试图还原“人是社会关系总和”的经典论断,从对西方经济学假设与现实的吻合程度产生怀疑开始,在经济理论中建设中国学派。

(一)西方经济学理论在描绘现实世界方面存在瑕疵

域观经济学的提出者金碚认为,“其实在完美的形式逻辑外观下,经济学也有其内在逻辑缺陷,不仅在逻辑推演中过度依赖于‘假定’条件,而且有的假定是脱离现实甚至无视真实的,为了贯彻工具理性而往往丢失本真价值理性。也就是说,经济学作为以演绎逻辑为主线的推理表达体系,实际上是存在‘逻辑断点’的”^③。在域观经济学开创性的论文中,金碚对西方经济学的假设逻辑体系基于中国文化基础的逻辑进行了检视,认为,第一个假定是“目的”假定,即假定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第二个假定是“自私”假定,假定人的一切行为目的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是自私的;第三个假定是“经济人”假定,假定人有能力进行理性计算,人人都是精于计算的利己主义者;第四个假定是“利润最大化”假定,从自然人、经济人假定直接推论出企业法人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第五个假定是“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假定在如同“空盒子”般的市场空间中,自由市场竞争机制(看不见的手)可以保证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可以实现市场的“一般均衡”。对于上述5个假定,金碚结合文化与制度因素进行了逻辑检视。对于第一个假定,认为暂且承认它的“公理性”,以避免陷入人是否“理性”的争议。对于第二个假定,认为除了“经济人”假定以外,还有“资本主义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以及“复杂人”等一系列假定,并非只有“经济人”一种假定可以自圆其说。对于第三个假定,认为从自私假定推导出“经

①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2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6页。

③ 金碚:《关于开拓商域经济学新学科研究的思考》,《区域经济评论》2018年第5期。

济人”假定,只是在人的个人主义自私性中加入了“经济理性”,“经济人”假定只是经济学追求逻辑自洽性的一个权宜之计,或是“次优选择”,并不是经济学逻辑的唯一。对于第四个假定,从个人主义“经济人”假定直接推演出“利润最大化”目标,更是一种武断的推论,并不符合经济现实。企业是法人,本身不可以感觉得到利益得失,它们既不会因盈利而快乐,也不会因损失而痛苦,它为什么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呢?对于第五个假定已不是假定而是假想,它是假想在“空盒子”般的市场空间条件下,由假想的原子般的自利经济主体进行最优化理性决策而推导出的结果,并非真实的存在。西方经济学的假定有很大的想象色彩,许多假定并不是现实世界真实存在的状态,带有浓烈的理想主义成分。要想校正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分殊,“最重要的就是必须依靠各种‘价值文化’因素和手段(价值文化可以体现为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显性或隐性人际交往关系),以弥合经济学抽象逻辑之断点”^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历史证明,我们的经济发展不是从假定开始的,而是从对现实世界的改造开始的,我们强调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们设立四个现代化目标,我们确立实现小康目标,都是基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现实考虑,没有一个是从经济人假定开始的,这里面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内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二)从理论上诠释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金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中国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基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分析。他认为,“中国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鲜明的‘中国式’和‘中国特色’的域观特征。其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在于,它不仅是新的历史性创造,而且确立了一个新的文明叙事范式:人类文明并不是基于‘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抽象社会建构,而是在复杂过程中所创造的多形态域类现象。”“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有不同的文明形态,各民族国家都有历史责任,为其繁荣昌盛作出各自的成就和进行各自的创造性贡献,而使人类发展的文明进程更加丰富多彩”^②。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也就是说,人不是冷冰冰的抽象物,而是处在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之中的活生生的人。“人性不可能离开社会的价值文化环境而作为赤裸裸的‘理性人’(经济人)而存在。所以,经济现代化,尽管是经济理性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文明化的过程。所谓文明化,则是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相互交融的复杂社会过程和心理过程。”^④具体来讲,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经济领域的反映,要从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三个方面进行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上述三种要素的排列顺序不是固定的。在经济一穷二白的时代,我们利用公有制的强大力量,建立了社会主义中国强大的物质基础;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后,我们张扬经济理性,实现了富起来的目标;在步入世界强国之林以后,我们擎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灵魂,实现了可持续发展。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经济学中国学派理论的有机衔接之所在。

(三)张扬经济理性、注重价值文化、优化制度形态

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提倡“实事求是”。“务实就是‘实践’,就可以判断‘真理’,这是非常符合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务实理性。这样,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在务实精神中逐步实现理性化,中国经济发展也走上理性化的道路。可见,当年的‘思想解放’,本质上就是解除对经济理性的束缚。思维方式的转变非常符合中国的务实精神,结果则是让经济理性得以张扬,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工业化进入加速推进的过程”^⑤。说明经济理性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改革开放40多年来

① 金碚:《关于开拓商域经济学新学科研究的思考》,《区域经济评论》2018年第5期。

② 金碚:《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不断探索中的伟大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和共同价值》,《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19期。

③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

④ 金碚:《中国经济发展中理性观念演变历程》,《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⑤ 金碚:《中国经济发展中理性观念演变历程》,《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与经济理性的唤醒密不可分的。然而,经济理性的具体形式并不是全球通约的,“在不同商域中,不同的思、言、行特征,以及思、言、行之间的关系特点,反映了各自的价值文化特征。在经济活动和管理实践中,价值文化和经济理性共同发挥着决定的作用”^①。中国经济发展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我们的财富观和其他文明不一样。比如将财富传给子女等后代是中国财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西方基督教的赎罪说使将财富交给上帝成为西方的重要财富观。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实施如包产到户、土地确权等一系列改革,最大限度地让人民可以把创造的财富传递给下一代,刺激了人们创造财富的愿望,极大地张扬了经济理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价值文化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思想的流动,“在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除了商品和服务贸易之外,还会发生思想的流动,不同于商品和服务大多具有竞争性,而思想因素大多为非竞争性,即可以免费复制。思想流动可以有力地解释经济发展和福利增进的很大部分。”“中华文明的历史是一部多民族多域思想流动和多元文化融合的历史,曾经的强大正是这一文明特质尽情张扬的表现;一度的停滞甚至衰落,则是自我封闭,特别是阻塞思想流动,僵化固守的后果”^②。这说明思想流动、价值文化的交流演进,对经济发展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发挥思想流动的重要作用,希望通过思想流动带动国内不同区域之间共同发展,秉持亲、诚、惠、容的理念,实现思想流动,带动所涉区域的经济共同发展。像中国首创的对口支援,就不为其他国家所理解,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这是不能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然而,对口支援在经济协作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不同地域间的思想流动,通过先进思想的流入,带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

党的领导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制度形态。“在不同的商域中,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质,而且,由于制度形态的不同特质(制度形态及其特性又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可谓‘文化是制度之母’),决定或影响着人的价值观念和经济行为”^③。由此引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党在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烈地影响制度构建(及改革)取向、经济决策方向和观念行为倾向,但党又不是如同经济学假设中的‘政府’那样的宏观经济决策(调控)主体或管制机构,党的角色和作用具有超然性。”从现实来看,“70多年的历史分期大多是由中国共产党的行为和决策(通常是党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决定)来划定的;各发展时期的秩序规则特征、战略决策倾向以至社会行为心理状态,都受到党的意志和行为的重大影响;甚至判断行为‘正确’与否,以及安排政策目标优先顺序的准则,也受制于党的意志和决定。……总之,只要实事求是地正视中国经济的这一重大域观特征,就会看到,影响以至决定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走势的关键因素,是党的角色和行为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这是符合中国现实的基本判断,“‘中国事实’的基本特色是:具有自我利益和自主决策能力的个人和各种类型企业是其微观经济主体;市场机制发挥调节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和经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通过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规管市场竞争秩序,并采取货币和财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而‘党’则作为集体理性的代表和决策力量中心,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实施方向引导,并在必要时做出体现集体(社会)理性和维护全社会共同利益的全局性重大决策”。^④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制度形态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体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直起着引领作用。

① 金碚:《关于开拓商域经济学新学科研究的思考》,《区域经济评论》2018年第5期。

② 金碚:《思想流动、域观常态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③ 金碚:《试论经济学的域观范式——兼议经济学中国学派研究》,《管理世界》2019年第2期。

④ 金碚:《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式承诺》,《管理世界》2020年第9期。

五、结论

研究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发现,可以运用域观经济学研究范式,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概括,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推翻了三座大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体现了“制度形态”;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领导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潮流,开创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彰显了“经济理性”;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集中展现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凸显了“价值文化”。总而言之,基于经济学域观范式对《决议》进行深度解读,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和更加深刻地领悟基于党的百年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伟大实践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的意义:第一,中国共产党是近百年来中国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新中国的每一点进步,都有中国共产党发挥领导作用的身影。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特征。第二,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以至强起来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思想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从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再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三份党的重要历史决议的各项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这表明党的领导人一脉相承的思想观念,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得以持续推进的关键因素。第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诞生了经济学中国学派理论,以域观经济学为代表的中国学派理论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关于物质文明方面建设,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支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产物。

The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Regional Paradigm of Economics

Li Xihui Yi Shenghui Huang Jixin

(School of Management,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P.R.China)

Abstract: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vened its sixth plenary session in Beijing from November 8 to 11, 2021. The session considered and adopted the Resolution on the Major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Party has led the people in pioneering a uniquel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reating a new model for human advancement, and expanding the channel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It was stated at the session that the major tasks of the Party in the period of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were to oppose imperialism, feudalism, and bureaucrat-capitalism, seek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nd create the fundamental social conditions for realiz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 major tasks of the Party in the period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were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new democracy to socialism, carry out socialist revolution, promot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lay down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the institution-

al foundations necessary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rough tenacious struggle,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of nation showed the world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had stood up and the time in which the Chinese nation could be bullied and abused by others was gone and would never return. This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poch in China's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people were not only capable of dismantling the old world, but also of building a new one. Only socialism could save China, and only socialism could develop China.

It was stated at the session that the major tasks of the Party during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ere to continue exploring the right path for building socialism in China, unleash and develop the productive forces, lift the people out of poverty and help them become prosperous in the shortest time possible, and fuel the push toward national rejuvenation by providing new, dynamic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as well as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for rapid development. Through tenacious struggle,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showed the world that reform and opening up was a crucial move in making China what it is today, tha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correct road that has led the country toward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and that China has caught up with the times in great strides.

It was stated at the session that following the Party's 18th National Congres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The major tasks facing the Party in this period are to fulfill the First Centenary Goal, embark on the new journey to achieve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and continue striving toward the great goal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rough tenacious struggl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shown the world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has achieved the tremendous transformation from standing up and growing prosperous to becoming strong.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s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new model for human advancement. The ideological concepts of leaders also come down in one continuous line, which are an important force for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region view paradigm of economics is an important product of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New model for human advancement;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Regional Paradigm of economics

[责任编辑:纪小乐]